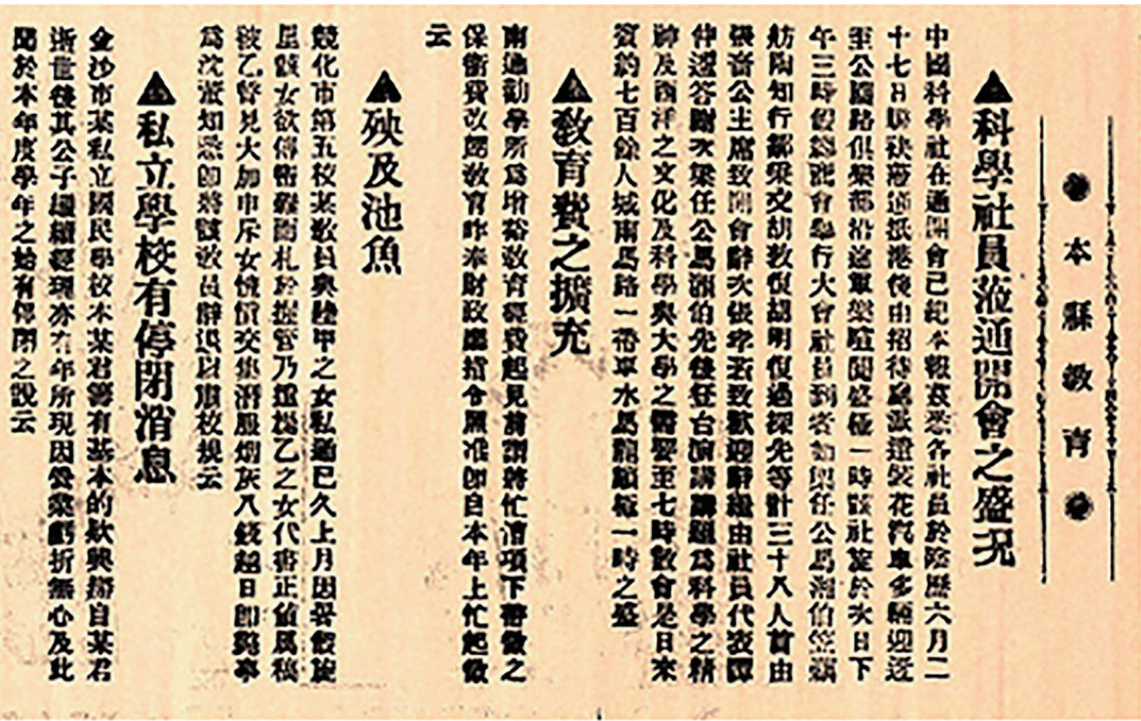


陶行知： 以张謇为师的教育家

□ 姜松延



陶行知



1922年，南通的《通海新报》报道陶行知等出席在通召开的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教育家、思想家。他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以及“爱满天下”的教育情怀与实践，对近代中国教育发展影响深远，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典范，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作为近代教育群体中的社会名流，陶行知的教育生涯深受张謇先生的影响。陶行知与张謇的直接交往始于20世纪20年代任教东南大学时。受张謇影响，陶行知产生了创办一所乡村师范学校的想法。在开办晓庄师范之前，陶行知就办学之事专门向张謇请教。张謇告诉他首先要学会学习农民、与农民打成一片。后来，陶行知曾在一次演讲中说：“我搞

生活教育，张謇是我第一个先生。”

张謇和陶行知年龄悬殊，但因为有着共同的民族责任感和教育兴国的理想，使得彼此在南通有了交集。191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去日本讲学。作为杜威的学生，陶行知极力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张謇得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重视，立刻发出邀约，终于促成了杜威先生于1920年6月的南通五日行。在通期间，杜威在更俗剧场和唐闸三次发表演讲，为南通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1922年4月至6月，南通、如皋等地被中华教育改进社(陶行知任主任干事)作为调研对象，组织进行心理测验，为国民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了依据。

同年8月20日至24日，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在南通通海泰总商会召开，作为社会名流、教育界的重要人物，陶行知应邀参加了这次年

会。会议期间，社员们参观了大生纺织公司、纺织学校，大有晋盐垦公司等，所到之处，陶行知不胜感叹，流连忘返。参观了博物院后，梁启超、杨杏佛、竺可桢、丁文江、陶行知和张謇等还在藤东水榭开会。晚上，与会代表在更俗剧场观看了伶工学社学生演出。南通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给陶行知一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5年6月，江苏省第五区民教研究会在南通东公园省民教馆开幕，研究会特邀陶行知于20日到会演讲，讲题为《普及教育问题》。有报道称：“陶氏讲演，诙谐百出，力言我国教育病态，最后指出正当途径，听众虽历四小时，面毫无倦色”。

说到陶行知与南通之间的联系，在教育界影响最大的当属他与小学生刘宝璠的故事。

1935年7月，陶行知在南通师范附属小学推广小先生制。他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不做工，要吃饭，什么人？

王八蛋。要吃饭，不读书，什么人？老母猪。读了书，不教人，什么人？不是人。”他通俗有趣的诗把学生们逗乐了。

这时，8岁的刘宝璠站起来认真地说：“陶先生，‘什么人？不是人’，可不大好。‘不是人’不具体，桌椅不是人，鸡鸭也不是人。‘不是人’还有点骂人的味道。”“真的，你说得很对。‘不是人’的确像骂人。请你给我改一改怎么样？”陶行知诚恳地说。刘宝璠当然不知道陶行知是一个留洋博士、大学教授，他想了一下说：“有了，改成‘木头人’怎么样？木头人是比喻，有一个具体的形象。”陶行知拍案叫好：“好，改得好；读了书，不教人，什么人？木头人。”他将诗抄在纸上，又特意写上：“南通刘宝璠小先生代我改诗，我多了一位小老师了。”

这个故事，使陶行知提倡和践行“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论以及“爱满天下”的教育情怀，更加深入人心，也使陶行知“人民教育家”的形象深深印入人们的脑海里。



历史人物

明代五知县： 清廉为政造福皋邑

□ 彭伟 薛海华

如皋历史上，涌现出许多廉洁奉公的官员。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出任如皋知县。其中明中晚期就有五位如皋知县，因为清廉从政，被载入诸版《如皋县志》。他们作为县官，或不畏权贵，或拒绝贿赂，造福皋邑，值得记述如下。

嵇鑑，字子佩，浙江德清人，嘉靖末年，以举人的身份，被任命为如皋知县。一到如皋上任，便有人私自送上2000奉金，想要干涉案件，遭到嵇子佩的拒绝。他在如期间，秉公执法，拒绝贿赂，才作为名宦，被录入志书。

唐邦佐，字中廓，浙江兰溪人，隆庆年间进士，任如皋知县。他在如皋为官，为人聪明，办事果断。志书称为“摘发如神”，即大胆揭发和查处各类违法的官员、百姓。无论官场，还是民间，如皋的各类“宿猾巨奸”几乎没有了。他的业余时间，多用于教授如皋学子。当时如皋的教育氛围很好，很多学子得以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唐邦佐是很清廉的，不仅没有贪污多余的公款，而是将政府多余的钱用于老百姓。如皋民间有着非常重的岁赋，需要上缴十万七千两银子，用于修造新船、筑造河堤。如皋百姓非常痛苦，为此唐邦佐用如皋官税的多余收入替代了百姓的岁赋，获得百姓的支持。据其他书文记载，唐邦佐还任职中枢，因为不畏权贵，遭到贬职。

宋文昌，字德夫，河南商城人，进士出身。万历己酉年，他出任如皋知县。他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官员。他体恤民情，不肯一意孤行。宋文昌对待别人，态度温和。不过，有人出于私心请他帮忙，他大义当前，态度严厉，绝不答应。作为一名廉官，宋文昌不仅如此。有多余的税收，他不会收来中饱私囊，而是全部取消。他还将收税方式规范化，有效地杜绝了其中的腐败现象。他按照法律，指定百姓定定时缴税，阻止一些官吏从中捞取好处。作为一名清官，他办理案件，是小心又小心，不想使人蒙冤。有一位卢学诗，长期遭到诬陷，被关在大牢里。宋文昌经过重新审查，又得到上级官员的支持，还卢学诗清白，把他释放了。如皋境内，有一座牙桥需要建立桥闸，确保农民耕种用水。为了修造桥闸，确保农民的利益，宋文昌决定舍弃一座盐场。可见，百姓在他的心目中，十分重要。当他离开如皋时，如皋人争着为他画像建祠。

李廷材，字柱可，广东高要人，进士出身。万历甲寅年，他出任如皋知县。他很聪明，表面上看起来很严厉，心中其实很坦荡很实在。因此，他能够为百姓办实事。李廷材体恤民心，常常到田间考察。他是一位将百姓利益放在心中的清廉官员。为了发展如皋的农业，他不惜得罪贪官、富商。通过实地考察，李廷材发现如皋紧靠江海，容易有水灾。如皋海拔高度比邻近县邑要高，土地比较干燥，不利于农作物耕种。全县灌溉主要依赖运盐河。如皋的老百姓耕种很苦，可惜收成不及邻近收成的五分之一。李廷材发现海边牙桥容易将运盐河分流排泄，威胁到如皋及邻近各县用水，于是他决定将牙桥堵起来。如此一来，损害了如皋盐商的利益。于是，奸诈的盐商就买通巡盐御史(贪官)，按人头定量售出夹带泥沙的劣质白盐，同时提高盐价。李廷材坚决反对，奸商暂未得逞。巡盐御史又连续发出九道命令，李廷材九次答复不可以。日后，他准备在县境内东南部修建石闸，那些上面的贪官以惊动龙脉为由，将他调离如皋。李廷材还被罚钱1200两，上缴新泰县令(如皋人)李上林。后来，李廷材客死镇江，妻子寓居当地，因为没有盘缠，不能回去广东。上缴罚金后由如皋县令熊佐文保管。熊佐文将罚金退还给李廷材夫人，李廷材的灵柩才得以回乡。如皋人为他树立了去思碑。

据《如皋县志》《明实录》等书记载，熊奋渭(1580—1674)，字佐文，河南商城县人，进士出身。万历丁巳年，他出任如皋知县。书中记载，熊奋渭“廉明敏干”，说明他是一位廉洁聪敏的官员。他识大体，爱民众，进行革新，造福百姓。他伯乐识马，于科考中提携冒起宗(冒辟疆的父亲)。后来他被调任泰兴县知县，升礼部给事中、户科都给事中、浙江巡抚、兵部侍郎诸职，活到90多岁，才离人世。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旧时南通地区的“打会”

□ 程太和



打会，俗称“请会”，是旧时由一个债务人向多个债权人，低息整借零还或零出整收的经济互助活动。是民间金融借贷的初级形式。往往由某一经济窘迫、急需一定资金的人出面接洽邀请，凑足10人(请会人除外)，由请会人收首会，以后会友间互为债务人和债权人，定期集会，按一定数额资金和方法，人人出会10次，收会1次。这种会是出会人对请会人的支持，须讲究诚实信用，大多是亲朋好友之间进行。行会资金数额可多可少，多则千元，少则几十元，甚至几元。

周期长的一年轮会一次，十年结束；短的一月一次，十个月结束。利息的高低则因地因时约定俗成。一般是经济条件好的地方高于经济条件差的地方，苏南地区的利息普遍高于苏中地区，苏北也有打会形式，但利息很低。

行会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方法称为“轮会”，即先议定会份的比例，再确定顺序，轮流收会。行轮会在拢会时，会友们先共同议定各次收会人每出会份的比例，确定会份后，由请会人收首会，然后会友们再用摇骰子比点数多少的方法确定一至底会收会人的顺序。另一种方法称“摇会”，在拢会时，会友们除向请会者每人平均出会份若干外，只论定行会的时间和利息额，以后每次行会时，会友们拿出会份和利息，由请会者收齐，然后当场用骰子摇出本次收会人，由收会人捧着骰得之款欢喜而归。行摇会因未收会者人人均有成为此轮收会的人的可能，所以具有刺激性，因而较“轮会”更为盛行。行摇会采用增额法，即未收会者每会只出会份，已收会者除会份外加一定利息。清末至民国初年，南通地区比较盛行“摇会”。

行会大多出于对请会人的支持，因此，请会人收首会后，以后每会一般不出利息，仅出会份。请会人为表示对会友支持的感谢，在每次行会时都备酒菜相待。除此外，请会人还负有重大责任，未拢会前自称纠会人，发帖邀满会友，拢会后每次行会改称首会人，负责请齐会友，

们拿出会份和利息，由请会者收齐，然后当场用骰子摇出本次收会人，由收会人捧着骰得之款欢喜而归。行摇会因未收会者人人均有成为此轮收会的人的可能，所以具有刺激性，因而较“轮会”更为盛行。行摇会采用增额法，即未收会者每会只出会份，已收会者除会份外加一定利息。清末至民国初年，南通地区比较盛行“摇会”。

行会大多出于对请会人的支持，因此，请会人收首会后，以后每会一般不出利息，仅出会份。请会人为表示对会友支持的感谢，在每次行会时都备酒菜相待。除此外，请会人还负有重大责任，未拢会前自称纠会人，发帖邀满会友，拢会后每次行会改称首会人，负责请齐会友，

收齐会款。集会地点大多设在请会人家中，届时由主人升起会旗，燃放鞭炮，请吃会酒，也有一番热闹气氛。

民间以请会活动经济互助，颇有益处，但因会规约束力不强，在旧时常会发生经济纠纷，甚至中止行会，闹到法院打官司的也不少。法院处理此类纠纷，也是“剪不断，理还乱”。新中国成立后，若有某户因建房造屋、婚丧嫁娶而资金不足时，则邀请五亲六眷、亲朋好友，凑足10人(也有多于10人的)，行请会之事。其时热热闹闹，欢聚一堂，既相互支持，又可零存整取，集众人之力，助一人成事，人人帮我、我帮人人。行会之风沿袭至上世纪60年代末，后因城乡金融信贷事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请会之风才日见其衰。

糖坊头的故事

□ 沈思高口述 扬波记录



在小乡镇庙桥头南边有座高高的铁路桥，铁路桥南侧有座塘坊桥，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叫糖坊新桥或糖坊北桥。真正的糖坊桥在南边二三百米的河上，如今只剩下河两边两个拱桥的基础。

在清末民国，塘坊老桥那里庙桥运河(庙桥运河民国地方政府开凿于1929年)上有座木桥，桥名起源于河东有个卖糖的老汉沈国扬。碰到哪里集会，哪里人家办丧事(吃豆腐)，他就挑着糖担去卖糖。糖块品种主要是带有纹路的明糖和芭蕉糖。那时物资极度匮乏，有糖吃绝对是享福了。

沈国扬生育两子三女，两子沈秀山、沈老根。沈秀山在糖坊头河北开茶馆店。抗战时期，几间草屋被鬼子付之一炬，沈秀山只得挑起酒板担子，以此为生。沈老根，大家称他老根麻子。沈老根子承父业，挑起糖担走村

串乡，品种上增加了卷头糖和包装卷烟，营业地点又增加了放电影场所。解放前，共产党游击队员经常在糖坊头伏击，其中一个游击队员赵某对沈国扬的女儿沈秀兰透露爱慕之情。不过，沈秀兰后来在上海扎根，结婚生子，九十九岁寿终。沈老根生育两子一女，长女嫁小海九大队黄祥荣。长子沈思品在姜灶高中毕业后上南通县师范两年，直到落实政策恢复工作。他在张芝山某校敲钟扫地，待遇和教师一样。他语言能力极强，经常帮人写诉状打官司，有“民间讼师”之号。

糖坊头解放前不仅是个热闹的地方，而且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战斗。1947年4月，我民兵截断了糖坊头一带的公路和电话线，张芝山还乡团下乡追击。我方打入敌人内部的一个内线，得知敌人下乡的消息后，及时转告紫琅区副区长盛学熙。通海独立营决定在糖坊头打一场伏击战。战斗开始前，战士们隐藏在民兵队长黄德昌家附近。当敌人大摇大摆从塌水桥上过来时，战士们一阵排枪打过去，敌人倒下了七八个，后面的一看苗头不对，迅速逃走了。这次战斗缴获步枪10支、子弹300多发，毙敌8人，俘虏3人。从此以后，糖坊头更加出名了。

糖坊头解放后仍然很热闹，有好几家路头小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河东有理发店、煎糖铺，河西有粮食加工厂、电灌站、熟食店、黄士高裁缝店、绸鞋铺、自行车行、茶摊等。

原来糖坊桥东边第三窰田有个严金宝坟很有名气，那里四周遍植柏树梓树，几棵梓树要两三人合抱。这个严金宝是南通城里的大官，故居在段家坝里面二百五十米，里面有几棵大银杏。糖坊东边有个75岁的老人讲，他8岁左右时，小孩子们常到坟地去玩，梓树有十几棵，最大的三个大人合抱，还有土地堂。他说，严金宝因抗倭而死，家人去海边捞尸，可茫茫大海不见踪影，只得用叉箕捞到一只海虾，权当遗体，运回下葬。后又买地一挑，建墓园纪念，由地方村民施广文祖上几代看管。著名蛇医季德胜曾到这里来捉蛇，看到这里古木参天、阴气森森，据说曾看到一条很

大的蛇。严家后人曾经清明骑马上山坟，将一把银酒壶忘记挂在树上，别人远看，以为是只草鞋，不以为意。第二年严家后人上山坟，看到银酒壶居然还在树枝上，可见这里来的人真的很少。1958年，集体挖了坟树制作绞关犁深翻土地，锯了板架桥，把坟平了增加耕地，严家后人也没有来追究。

1959年，南通县人民政府庙桥河拓宽改造拆除了原来破烂的木桥，建造了砖混结构的拱桥，命名为“金通河二号桥”。那时桥头是交通枢纽：桥西是一条公路，向南到张芝山，向北到姜灶，一直沿河通到施家小埭西头进而到朝阳港；桥东一直通到炮台双桥。1992年秋天，糖坊桥东北角黄启标推着自行车从桥上经过，刚过桥，桥梁轰然倒塌。黄启标死里逃生，回家“吃面”解灾。

前几年，位于老糖坊桥东桥堍北边横河上的农桥改造，桥就位于卖糖后人沈思品、思高后面，本该取名沈家桥。但造桥师傅是南通、如皋一带的人，沈孙不分，成了孙家桥，有关部门不闻不问，也就这么叫了下来。